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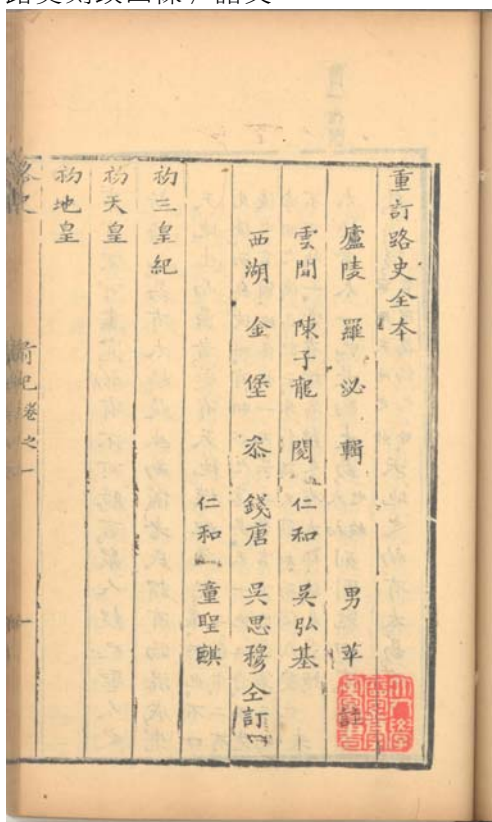
文稿

「東海」館藏《重訂路史全本》刊印時間再考

郭明芳*

「東海大學圖書館」館藏一部《重訂路史全本》，《舊錄》作「清順治十七年(1660)仁和吳氏刊本」，然無任何資料可佐證下，今《書目新編》暫改爲「明仁和吳弘基重訂本」。此本東海《舊錄》著錄順治年間(清初)刊本似有其依據，不當僅依吳弘基所署時間暫訂爲明代所刊。筆者以本文再考論其刊印時間如次。

據《善目新編》載，是本版式行款爲左右雙欄，板框 12.7×18.5 公分，每半葉八行行二十字；板心花口，無魚尾，上方題「路史」，中間題「○紀卷之○」及葉碼。前有宋羅泌〈序〉、宋費輝〈序〉、明金堡〈敘〉、〈賦秋山覽史隨筆〉、明吳弘基〈路史刻政四條〉諸文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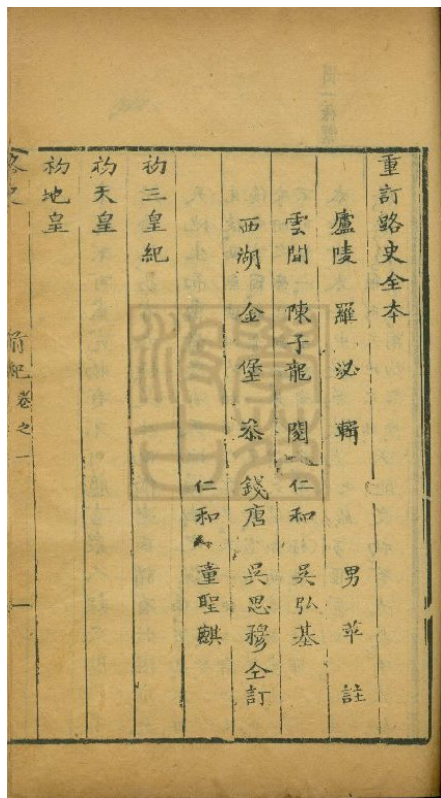
「東海本」《重訂路史全本》書影

* 東吳大學中文所博士班

查《重訂路史全本》，臺北「國圖」有藏一部(四十七卷，廿四冊)，著錄「清嘉慶六(1801)年刊本」。又「美國國會圖書館」亦著錄一部十六冊八行廿字本，著錄稱「明末武林化玉齋刻本」，其內容細目包括《路史前紀》九卷、《路史後紀》十四卷、《路史國名紀》八卷、《路史發揮》六卷、《路史餘論》十卷；卷前有金堡〈序〉、宋淳熙丙申三年費輝〈序〉、吳弘基〈賦秋山覽史隨筆〉。

以上兩種所見惟「國圖本」似與「東海本」同，而「國會館本」則應非。

又查「北大」有兩部，分別著錄「清嘉慶六(1801)年西山堂」(甲)、「清乾嘉間(1736-1801)西山堂」(乙)。又「廈門大學」亦有一部著錄「嘉慶六年刊本」。以上三種似與「國圖」著錄同。



「北大」甲本書影

「北大」甲本有扉頁，署「嘉慶六年五月新鐫」、「重校宋本鐫。西山堂藏版」另函套有籤，稱「谷邑文會堂自在江浙蘇閩揀選古今書籍發兌」字。

按，「西山堂」，據「內大」藏本著錄作「苕溪邵氏」，「苕溪」在今浙江湖州。其刊書最早者可溯自雍正間的《易史易簡錄》（《哈佛燕京書志》，頁

61-62)又「谷邑」或在今山東東阿縣，專門經銷南方書籍書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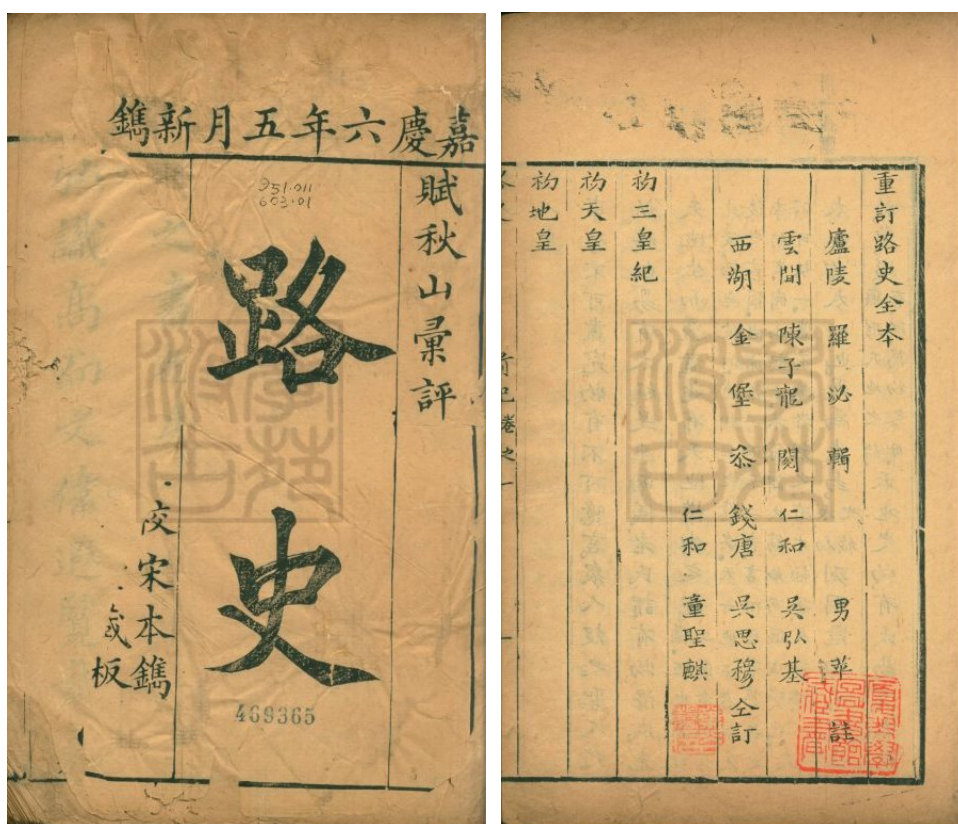
「北大」乙本據該館著錄「與館藏嘉慶六(1801)年西山堂刻本同版，而印在前」，著錄為「乾嘉間刊本」。

針對該館稱「乙本」「印在前」，筆者認為「印在前」之說沒有確切證據證明，無法成立。

筆者以「北大」所藏甲、乙二本、「廈大本」與「東海本」相對照發現「東海本」與此三本為同版，甚至有斷版處也相同。但孰先孰後，筆者就刷印痕跡加以判定。筆者認為「東海本」刷印痕跡與「北大甲本」、「廈大本」接近，如署名處「仁和童聖麒」、「雲間陳子龍閱」等兩處墨丁或筆畫。因此，「甲本」與「東海本」於相同處有墨丁，兩者應該同時所印。如乙本印在前，且與「甲本」同版，那要如何解釋「東海本」文字較「乙本」清晰？既然知道「甲本」乃山東專收購南方書肆出版品所出售之本，或許可以這麼說，甲、乙兩本印於同時，「谷邑」取南方諸家刊本，冠以本家「谷邑文會堂」書籤售於北方者。而「乙本」當在是「西山堂」原本，「甲本」乃「文會堂」收得本書後另改扉頁而成，其時間當不遠。故「東海本」或為「嘉慶六年西山堂刊谷邑文會堂重裝本」。



「北大」乙本書影



「廈大」藏本書影

又據《東海善目新編》稱，是書「各卷首葉，除了作者與註者相同外，參預校訂的人員皆有異」，並詳列之。其中列有：

卷五之三行上題「雲間陳子龍閱」、四行上題「西湖金堡參」，三行下題「仁和吳弘基訂」、四行下題「錢塘張孔法較」。

最末「較」字引起筆者懷疑，此本是否為明末刊本。按，明天啓名「由校」，應避諱之。又查《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中國古籍目錄》亦著錄一部《重訂路史全本》四十七卷，云：

清嘉慶六(1801)年西山堂刻本。二十冊。是書牌記題：「嘉靖六年五月新鐫。重校宋本鐫。西山堂藏本」全書用明吳弘基刊本舊版甚多，清諱皆不避，而新鐫版片則避清諱。

通過「港中大」藏本，或可再對前述考訂再修訂為「明末刊清嘉慶六年西山堂補版谷邑文會堂重裝本」，較為恰當。而東海《舊錄》作「順治年刊本」，或據避諱角度所訂，並非無據，惟未再詳查矣。